



古代词史与词学史说略

◎ 刘 石

词史是词创作的历史,词学史是研究词作及与词作有关问题的历史。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词学研究的历史与词创作的历史是大致同步的。

隋唐之际至唐末五代之前,词体已经兴起,词作陆续出现,但既没有专力作词的词家,也没有以大力作词的词人,甚至没有以词名家的词人。于词史为初起时期,相应地,于词学史亦为萌芽阶段,一些有关词的评论和记述开始出现。有人将《旧唐书·音乐志》中李世民论乐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古代词学论著的开篇(见《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这似乎稍显牵强。李白有《清平调》3首,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已明加称引,《尊前集》又收其作12首,但李白集中并无一语论及词体。中唐元稹有《乐府古题序》(《元稹集》卷二三)一文。其中“选词以配乐”、“由乐以定词”等句被后人作为词文与词乐两种配合模式的经典表述,但其文旨在论述乐府,不在词作。张璋、黄畬所编《全唐五代词》收入元稹词作两首,究否属于词作,深可怀疑(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新编《全唐五代词》,只收其中一首,且入诗词难定之“副编”,是)。元稹于词之一体有无意识,尚难遽断。但元稹的朋友确是有此意识的,如白居易,宋人所编《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收其词作28首,且有《忆江南》(江南好、江南忆)、《长相思》(汴水流)等名篇流传后世。中唐与词有关的文字逐渐增多,刘禹锡《忆江南》(春去也)题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刘禹锡集》外集卷四)之句。尤其重要的是其《竹枝词序》(《刘禹锡集》卷二七):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

刘禹锡仿作的《竹枝词》九首虽在诗集中,却亦早入词集(《尊前集》),当地人所唱之曲亦应属词作。所以,这段文字形容贬所(夔州)当地青年所唱《竹

枝》“激许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便是对他人词作风格的一种评论。将这篇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所作的序文视作词学研究之滥觞，庶无大过。长庆三年，李德裕为中唐诗人张志和所作《渔歌》(又名《渔父》)五首作记，即《玄真子渔歌记》：

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于戏，渔父贤而名隐，鸱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欤。处二子之间，诚有裕矣。(《李文饶文集·李卫公别集》卷七)

张志和《渔父》五首为《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等词选所载入，这是今天所存最早的一篇题记，与上引刘禹锡文一样，也是最早有关词的文字之一。诚如吴熊和所说，宋人常为词作题跋，盖可溯源于此。但也如所说，这篇题记主要感叹张志和“隐而名彰，显而无事”，对五首词作本身并未正面论及(参《唐宋词通论》第五章)。

总之，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 with 词体创作状况同步，均属于草创阶段。

词体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晚唐、五代趋于成熟。曾昭岷等所辑《全唐五代词》，可信为词者为正编所收 1963 首，晚唐以前词作不足十分之一。由于温庭筠、韦庄的出现，词的成熟时间足以定在晚唐。但温庭筠词几乎全收入《花间集》中，韦庄乃由唐人蜀之人，且词作十之九亦见于《花间集》，他们素来被视作“花间”词人。如果说词体至五代十国始进入与诗体独立抗行的时期，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伴随词创作的步伐进入新阶段，应该是更为准确的。就是说，词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个高峰的标志体现在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和稍后的南唐词。

与此相应，词学史上第一篇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出现了，就是欧阳炯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的《花间集序》(文常见，故不录)。这篇词学史上的第一篇词集序文，虽然在正面的理论建树上尚不能和后来的词学著作相比，却反映了词与音乐紧密结合的特点，更描绘当时词作者的身份、创作动机、词作产生的环境，所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正是这种创作背景和动机，从根本上决定了“花间”词情恋题材和软媚风格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不仅属于“花间”词，也属于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所有婉约词。换言

之,如果要理解婉约词特征何以形成以及何以长期占据主导,我们是可以从中捕捉到非常丰富的信息的。

如所周知,从整部词史考察,词创作的繁荣期出现在宋代和清代,而以金、元、明三代为较弱。唐圭璋《全宋词》录入词人 1330 余家,词作 19900 余首。此后孔凡礼又自明钞本《诗渊》中辑得两宋词作 400 余首,成《全宋词补辑》。这一时期的词作处于词体的上升阶段,充满活力和生气,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人间词话·未刊稿》)。胡适 1926 年为所编《词选》作序,将自晚唐到元初称为“词的‘本身’的历史”,“本身”的历史就是词体天然生长和自然演变期。其成就之巨大,特点之鲜明,以至于元明以降的文论家无不将之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茅一相《词题:评〈曲藻〉后》:“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明沈宠绥《弦索辨讹》:“三百篇后变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引)清焦循《易余籥录》卷一五:“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王国维也将之作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著名论断中的一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

金、元、明三代,词作式微,无论作家、作品,数量、质量,较宋代均有一筹之逊。前人于此所论亦伙,如称“金元工小令(指曲)而词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元有曲而无词”(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朱彝尊《水村琴趣序》),“词至于明而词亡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但金、元、明三代何尝无词。唐圭璋所辑《全金元词》收金、元两代 282 位词人,7293 首词作。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收有明一代词人 1396 家,词作约 20000 首。可知上引诸论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金、元、明词作为“一代之词”,虽然“亦有不可尽废者”(王昶《明词综序》),但终非鼎盛期,无法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胡适《词选

序》称此期为“词的‘替身’的历史”，倒是比较形象的。

有清二百余年间，虽然胡适称“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词选序》），王国维评清初“云间”词以“彩花”二字溢之，胡云翼更以“堕落”二字总括“清人的词”（《中国词史略》第六章），但更多的论词者却以两家与之相比，因为有清词坛与此前三代情形毕竟不同，其间词家风起，词作云涌，风格争鏖，流派并驰，素有“复兴”之称。其时词人词作数量众多，远近宋、金、元、明四朝之总数。清词总集自嘉庆间王昶编《国朝词综》起，至上世纪20年代末年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止，代有人编。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清词》（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编）则为集大成之作，就仅出的顺治、康熙二朝部分统计，作者已达2105人，词作53400余篇。

数量可以说明问题，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清词的成就，上引二胡的评价很低。其实其弊病也未必若此之甚。坚秉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胡适，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得不充分肯定清词的成就：

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的，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词选序》）

叶公绰《全清词钞序》亦说：“往年我同友人论清代学术，曾认为清一代的词，越过明代。此外唯小说和曲子，勉强可以企及，而诗文则否。后来拿这话请教文廷式、朱祖谋两先生，皆颇为以为然。文先生曾说过，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朱先生也曾对我说，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两先生为近几十年词坛砥柱，所实可代表词家公论。”

由上述可知，整部词史的发展呈现前后高、中间低的马鞍形。

词学史与词史的情形正相适应，具体说，宋代和清代的词学理论、批评与研究较为兴盛，金、元、明三代相对岑寂。从唐圭璋《词话丛编》来看，所收宋代11部，元代2部，明代4部，清代多达51部。仅就词话一隅观察，似亦可以看出词学研究盛衰的大致情形了。

宋代以降以至清末，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词学研究，一篇短文无法详论，即使提纲挈领也甚难措手。不得已，且从清人一些大型词话类编类著作的分类中粗探梗概。清康熙间徐钊钞撮群书，汇成《词苑丛谈》12卷。嘉庆间冯金伯在徐书基础上辑录、汇编词话1500余则，纂成《词苑萃编》24卷。

冯氏在徐书基础上稍加变动,将全书内容归为体制、旨趣、品藻、指摘、纪事、音韵、辨证、谐谑、余编九类。“体制”类是考诗词之离合,气体之同异,词体之正变;“旨趣”类是溯词体之渊源,穷词体之闾奥;“品藻”类是搜讨名人绪论,以己见参之;“指摘”类是一以见欣赏之情,一以寓别裁之意。“纪事”类是搜采逸事可传佳话者,以供麈尾闲谈;“音韵”类是考究词韵,以沈东江《词韵略》为准则,间采诸家之说;“辨证”类是词有寄托,而说分彼此,传疑传信,故细加详考,以归于划一;“谐谑”类是里巷小词,未必无关风化,故间采杂体,使览者警省。余编类收入各编难于附丽及可附丽而偶尔失载的内容(参二书凡例及序)。

有意识以现代学术眼光对历代词学研究状况加以分析、总结的是现代学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龙榆生提出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凡八项(见《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其出发点虽在为今人指引词学研究的方向,实亦可视作对过去词学研究史的总结。1981年,唐圭璋、金启华合撰《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第一辑)一文,其意更全在总结,将历代词学研究的内容归为十类,即:一、词的起源;二、词乐;三、词律;四、词韵;五、词人传记;六、词集版本;七、词集校勘;八、词集笺注;九、词学辑佚工作;十、词学评论。不过文章所论虽以古代为主,亦兼及近现代,有些类别是古代所没有或基本没有涉及的,如“词人传记”一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线索去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词学史的基本面目和丰富成就。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 文学典故 ·

一字千金

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秉政,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他命门客各著其所闻,汇集为《吕氏春秋》一书。书成,吕不韦令公布于咸阳城门,同时悬千金于其上,声称有能增删一字者,赏千金。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亦仿效此法,悬千金以征求意见。后代遂以“一字千金”喻文学作品或书法的造诣深湛。如梁朝诗歌理论家钟嵘的《诗品》,称赞《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典见《史记·吕不韦列传》)